

中外

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

● 著者 / 于桂芬

西风东渐

—— 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商务印书馆



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

西 风 东 渐

——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于桂芬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1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于桂芬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ISBN 7-100-03273-3

I. 西… II. 于… III. ①比较文化-中国、日本
②中国-摄取-西方文化-研究③日本-摄取-西方文
化-研究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0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

XI FENG DONG JIAN

西 风 东 渐

——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

于 桂 芬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273-3/K · 694

2001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18.00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西学东渐的发轫	(24)
一、东西文明的相遇	(24)
二、最初的接触	(27)
三、耶稣会士的东来	(33)
四、所谓“拉丁文明”时代	(42)
(一) 天文学	(43)
(二) 地理学	(46)
(三) 医学	(53)
五、中日西学水准的比较	(56)
第二章 “锁国闭关”时代	(68)
一、由“禁教”到“锁国闭关”	(69)
(一) “禁教”政策的出台	(69)
(二) 限制外人措施	(80)
二、了解西方的渠道	(83)
(一) “风说书”制度	(84)
(二) “漂流问题”	(87)
(三) 外国使团商馆参拜	(95)
三、西学传播的不同趋向	(100)
(一) 康熙大帝与德川吉宗	(100)
(二) 中国:西学东渐的断落	(103)
(三) 日本:兰学的勃兴	(108)

四、历史影响·····	(112)
(一) 危机意识的萌生·····	(112)
(二) 近代世界观的形成·····	(114)
(三) 精英集团的出现·····	(118)
第三章 “开国”时期西方文化的摄取·····	(124)
一、“外压”冲击波·····	(125)
(一) 炮口下的震撼·····	(125)
(二) 柏利“黑船”叩关·····	(137)
(三) 被动“开国”·····	(141)
(四) 中日两国“开国”进程的比较·····	(144)
二、摄取西方文化的媒介·····	(151)
(一) 译书、著书·····	(152)
(二) 使节出洋·····	(159)
(三) 留学·····	(164)
三、摄取西方文化的进程·····	(171)
(一) 西洋军事技术的引进·····	(171)
(二) 对欧美国家制度的介绍·····	(185)
(三) 西洋物质文化的传入·····	(194)
第四章 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204)
一、求知识于世界的举措·····	(205)
(一) 遣使西洋·····	(205)
(二) 教育改革和留学生的派遣·····	(212)
(三) 聘用外国专家·····	(218)
二、西方文化传入的轨迹·····	(223)
(一) 近代工业化的展开·····	(223)
(二) “西政”的引入及实践·····	(231)
(三) 社会生活的西化·····	(244)
三、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262)

第五章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277)
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279)
(一) 中国:东西文化论争 ·····	(280)
(二) 日本:法西斯主义对西方文明的反动 ·····	(289)
二、战后时代·····	(298)
(一) 日本:“第二次开国” ·····	(299)
(二) 中国:对外开放的顿挫 ·····	(308)
后 记·····	(317)

导 论

十五、六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进程,西欧殖民主义者开始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和殖民扩张,它彻底打破了古代农业社会人类文明区域分割、孤立发展的状态,使世界各区域文明间的交往联系成为可能,也由此揭开了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的序幕。世界历史上这场空前的“大转折”、“大过渡”和“大变局”,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②资产阶级凭借着“坚船利炮”,按着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手段改造着旧的世界秩序。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当时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东方诸国要想避免民族危亡的厄运,就必须迅速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现代化。但从世界历史上看,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极度发达的形势下,历史已不允许这些国

家自生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只能通过学习、摄取的手段,即“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③进而实现现代化。而在学习和摄取西方文明之前,东方国家必须首先调整、改变传统世界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科学的、客观的估价,形成新的世界观,一切才能顺利地进行。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非西方国家新的近代世界观的形成和摄取西方工业文明的进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各有异同,许多民族常常是经过长期反复的认识,甚至是几代人的艰苦探索,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勃兴以来激变的世界文明格局有了清楚的认识,才改变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排斥态度,结果在时间上错过了实现现代化的最佳时机。由此可见,抛弃农业时代狭隘的传统世界观,树立全新的近代世界观,大胆摄取西方工业文明,并进行细致的消化咀嚼,使之在本土生成现代文明之根,是东方国家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工业社会最为关键的历史课题。

本书拟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对 16 世纪至 20 世纪中日两国摄取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一宏观比较研究,并借此对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和解释。

应该承认,自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研究反思日本明治维新何以成功、中国维新变法何以失败的原由开始,到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兴起的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的浪潮,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政治家、思想家一直没有中断对中日现代化不同命运的历史探索,并已经取得了一批颇具深度的研究成果。

但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时代之剧烈变迁,史学主体之于史学客体的认识和阐释非但不会终结,反而会更加深化,如同人类之于真理的认识和阐释不会终结一样。作为一个研究时段长达 400 多年,贯通东西,兼及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性研究课题——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目前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是远远不够的,仍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以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此,笔者在平日研究的基础上,拟从以下 3 个方面对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明这一复杂的历史课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首先,注意研究揭示中日两国摄取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动态纵向发展进程

在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等具体的“事件比较”问题上,而忽略了对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纵向发展过程的“长时段”宏观研究审视,这就使得我们的研究长期停留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上,难以窥见两国摄取西方文化动态发展演进的规律,总结其得失教训。鉴此,笔者在本书中力求变“事件比较研究”为“过程比较研究”,将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历史进程分为 6 个时期加以比较研究考察,并注意揭示各时期之间发展演进的内在联系:

(1) “拉丁文明”时代

此时期主要是指从 16 世纪上半叶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殖民侵略者来到远东,到 17 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采取“锁国闭关”政策前

的百余年的时间。从比较角度看,中国接触西方略早于日本。1517年8月,当葡萄牙人冒充满刺加贡使,以朝贡为名始通中国时,日本人尚未与西方发生直接联系。直到1543年,3名葡萄牙人乘船抵达日本鹿儿岛县南之种子岛时,才揭开了日西关系史的序幕。当时的中国是西方殖民主义者贸易和传教的主要目标,在与西方的接触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这决定了此时期两国摄取西方文化不同的演进轨迹。

这一时期在西学东传进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是耶稣会传教士。比较观之,来华耶稣会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博学多识之士,他们为了在封建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赢得信徒,主要接近封建士大夫,采取“学术传教”方式,大力译刊西书。而在日本,由于战国时代的诸侯纷争,均渴望得到枪炮和贸易利润,故耶稣会士主要接近的是地方诸侯大名,没有采取“学术传教”策略。这导致传入中日两国的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在中国,通过耶稣会士译刊的120多种科学书籍,西方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武器军火制造技术等开始传入中国,构成了这一时期输入中国西学的核心内容。相比之下,这一时期进入日本列岛的西方文化多是铁炮、望远镜、钟表、世界地图等实用品。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此时期中国摄取西学在层次上要高于日本。但从西方文化对两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看,两国的情形却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此时期所输入的西方文化虽然不如中国高深,但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主要表现在:枪炮技术的传入,改变了日本传统的短兵相接的近距离战术,加速了日本由战乱割据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而世界地理知识的输入,则改变了日本人传统狭隘的“三国世界观”,令其视野

大开,为日本进一步摄取西方文化准备了条件。而在中国,入传的西学仅在李之藻、徐光启等极少数醉心西学的开明士大夫中得到理解和认同,绝大多数封建士子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视西学为无用之“奇技淫巧”,可有可无之物,社会影响甚微。

(2) “锁国闭关”时代

所谓“锁国闭关”时代,主要是指从17世纪中叶德川幕府发布“锁国令”,严禁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取缔天主教,确立锁国体制开始,到19世纪中叶中英鸦片战争爆发长达20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德川幕府和清政府先后采取了严格的对外限制政策,对中西、日西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中日“闭关锁国”政策产生于相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又皆以对外封闭限制为宗旨,因而,学术界通常将二者相提并论,统视为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腐朽统治所采取的消极被动的自卫措施。而笔者则认为中日“锁国闭关”政策存在着极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锁国闭关”政策产生的思想基础不同;“锁国闭关”体制下两国的对外认识防卫机制不同;“锁国闭关”时代两国对西学的态度不同。

从比较角度看,“锁国闭关”时代中日两国的“西学观”和摄取西学的政策已产生了很大的不同。日本在“锁国时代”,其西学政策演变以1720年德川吉宗“洋书解禁”为标志,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锁国时代前期(1633年至1720年)。1633年,在德川幕府颁布的“锁国令”中曾明确规定除荷兰文的医药、航海等书籍之外,不准输入其他欧洲学术文化,这标志着西学大规模输入日本的“拉丁文明”时代的结束。但锁国并非常人理解的那样密不透风,幕府虽然断绝了与欧美国家的往来,但却保留了与荷兰的关

系。在幕府的直接控制下,通过长崎这个贸易窗口,西洋现代文明如同涓涓细流,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荷兰驻日商馆还必须向幕府提供“荷兰风说书”,汇报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使得幕府在闭锁的环境里,仍可由长崎一孔瞭望世界,在世界风云变幻异常,民族危机日渐严重的情况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第二阶段是兰学勃兴时期(1720年至1853年)。1720年,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下令禁书中除与基督教有关系的部分外,允许其他洋书输入,为日本大规模摄取西方文化准备了条件。1811年,幕府还设立了“蕃书调所”,主译西书。这样,日本虽然仍处于锁国体制下,但在官方的直接支持下,兰学却得到很大发展。在日本兰学家的努力下,兰学很快就从医学领域扩大到天文学、地理学、理化学、博物学等方面,由此日本进入了大规模摄取西方文化的历史阶段。

而在闭关时代的中国,随着清政府对外限制措施的日益严密繁苛,中国吸收西学愈加艰难。尤其是在1720年,因“教仪”问题,清廷与罗马教皇发生争执,由此导致“禁教”政策的出台,由于耶稣会士是传布西学的最主要媒介体,“西教”被禁,西学也就随之失去了它的寄生体,由此标志着自明朝开始的西学东传局面的结束,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这与日本兰学的勃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 “开国”时代

“开国”是地理大发现、西力东侵和工业革命以来东方国家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意指一个国家放弃“锁国闭关”政策,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在中日两国历史上,所谓“开国”时代,主要是指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20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虽然

为时短暂,但在中日两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折进程中却显得格外重要。

1840年,英国“东方远征军”为维护可耻的鸦片贸易,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清政府固守多年的“闭关”体制也被迫宣告结束。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有感于战争惨败,开始放下天朝虚骄的架子,睁眼看世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世界史地研究热潮”,同时开始仿造洋炮、洋船,摄取以“坚船利炮”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官僚士大夫的“华夷观念”并未崩溃,战后产生的危机意识也就难以持久。随着1849年“反进城斗争”的胜利,清政府中的“攘夷派”又掀起了盲目排外的攘夷运动,遂使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萌生的微弱的开放气氛荡然无存,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攘夷排外倾向仍有增无减。

鸦片战争虽然发生在中国,却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效应,加速了日本摄取西方文化的进程。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黑船”叩开日本大门,逼迫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结束锁国状态,走向开国。在“开国”时代,日本幕府一面派遣使团出使欧美各国,一面组织留学生赴西洋留学,以亲身了解和体验西方文化。同时,还大力摄取洋炮、洋船、火车、电报、西服等西方文化,并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可见,学术界将日本德川幕府与19世纪中叶的清政府统视为顽固、保守、排外的封建势力的代表,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4) 维新自强运动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到该世纪末叶,是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

实现现代化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时期。从 60 年代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崛起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旗帜,率先发起以摄取西方近代军事技术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运动。稍后,日本列岛上发生了亚洲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事——明治维新。由于二者都是以学习西方为手段,试图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因而,学术界对这两大历史事件的比较研究最为充分。笔者认为,在摄取西方文化问题上,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具有诸多根本不同:

其一,在吸取西方文明问题上,日本明治维新采取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同时并举,多层次的摄取方法。不仅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而且积极仿效欧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虽然从历史上看,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并不彻底,但毕竟形成了一个全方位摄取外来文明的机制,从而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此相比,中国的洋务派在吸取西方近代文化过程中仅仅停留在物质技术层面,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体系丝毫没有兴趣。戊戌变法时重点又落在政治方面,始终缺乏一个系统全面摄取西方文化的纲领和具体操作计划。

其二,两国追求西方文化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国内学者武安隆发现:从明治初年开始,日本对外来文化在情绪上呈周期性变化,“大约每 20 年左右,‘热情吸收期’与‘冷漠抵触期’便要交替出现一次”。^④从 19 世纪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后期,在日本历史上一般称作“文明开化时期”,是近代后第一个“热情吸收期”,其特点表现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狂热追求,出现了疯狂的“留学热”、“旅欧热”、“西方热”、“食牛肉热”等对“欧风”的狂热追求,甚至出

现了与欧美优秀的白种人通婚的“人种改良论”和“废日语论”等极端的提法。在“文明开化”的狂潮中,西方近代文化潮水般地涌入日本列岛。但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出现了“对“欧化热”的反弹——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又出现了新的“热情吸收期”。通过这样的“热冷交替”,日本民族得以在“欧化热”和“国粹热”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进而实现对外来西洋文化的消化。

与此相比,19世纪6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洋务派,虽然承认西方近代文明高于中国,但仍认定洋人在“文武制度”和“礼义纲常”领域内远远不及华夏,认为只要能将“外人之长技”学习到手,便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即使是在19世纪末叶崛起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虽然将“西人之长技”的范围由“西器”扩充到“西政”,但仍不惜笔墨论证西方文化之本源乃在中国,大倡“西学中源说”,没有出现日本明治维新后由热到冷的态度转化过程。

(5)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从20世纪20年代起到40年代,是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极具特色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而相继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权比清政府终究多了些现代色彩。因此,在这一时期,日中两国国内已不再就吸取西洋近代物质文明问题进行争论,而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本土精神文化”和“西洋外来思想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等问题展开。

在日本,除了30年代之前十余年间曾出现过短暂的“热情吸收西洋文明期”之外,从30年代初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均处于“冷漠抵触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侵略战争的不

断升级,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大力排斥西方民主制度和文化。认为“明治维新以来,接触了新的欧洲文化,并急于采用模仿,结果使崇拜欧洲之弊风弥漫全国,对于国体之尊严及皇国古来之文化产生错误的价值认识”。^⑤要求不断清除欧洲文化的影响,恢复日本的传统文化。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出现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又一次“中西文化大论争”。论争的一方为陶希圣、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一方为狂热的“全盘西化论”派,以陈序经为代表。此外还有一部分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折衷论者”,以胡适为代表。从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看,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本位文化”受到“客位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台湾学者殷海光称之为“本土运动”,^⑥这场论争实质上探讨的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如何重建中国文化的问题。这既与“九·一八”事变以来严重的民族危机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是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摄取西方文化进程的一次理论层面的总结。

(6) 战后时代

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1945年8月中国抗战胜利和日本战败投降,都是两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两国摄取西方文化问题上也是如此。

很多日本学者把因日本战败和美军占领而造成的开放与1853年柏利“黑船叩关”造成的“第一次开国”相比照,称之为“第二次开国”。在美军占领的状态下,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进行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的改革。美式的议会民主制、教育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被输入日本列岛,形成了明治维新以来第3个摄取西方文化的“狂热期”。纵观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历

史轨迹,可以发现,日本正是在“战败国”和“被占领国”这一严峻的国际形势的压力面前,通过民主化改革,大力摄取西方文化,并巧妙地利用冷战条件下特殊的国际环境,成功地实现了经济飞跃。

而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来自国际环境的挑战则远比日本更为严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封锁以及五、六十年代之交中苏关系的破裂,妨碍了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使中国在摄取、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成果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其次,注意深入总结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

从16世纪上半叶中日与西方世界开始正规频繁接触,到战后时代,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进程历时400余年,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历史课题进行宏观比较研究,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在全面叙述以上6个时期两国摄取西方文化具体过程的同时,亦应注意深入总结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以获取有益的现实启示。

笔者认为,总结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应泛泛而论,而应进行具体的分析比较。就总体而言,日本摄取西方文化比较成功的时期有:(1)“拉丁文明”时代——揭开了日西关系史的序幕,使日本列岛“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气氛”,“日本人扩大了视野”。^⑦(2)“锁国”时代——锁国虽然一度抑制了西方文化的传入,但却保证了日本列岛长达200余年的和平,得以集中消化此前摄取的汉学。同时,“锁国”时代后期兰学的勃兴更使西学